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 大学蠡测

张晓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晓东 著

# 大学蠡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蠡测/张晓东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214-16794-1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儒家②《大学》—研究  
IV. ①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978 号

书 名 《大学》蠡测

---

著 者 张晓东

责任编辑 王保顶

装帧设计 刘葶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6794-1

定 价 40.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大学》作为儒家核心经典之一，既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中华文化乃至中国人的个性、性格上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与西方哲学偏于外向开拓而走向非人化、片面化的逻辑理性迥异。（在古希腊，这种逻辑理性还夹杂着些许人文思考，到中世纪则异化为宗教理性。近代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但它从根本上受控于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即所谓“资本的主义”，在“资本的主义”这个支配性逻辑之下，所谓“理性主义”的历史命运也注定是工具性、功利性的，这就是当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用——工具理性大行而人文精神全面沦丧的深层原因所在。）中国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即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致思模式，并从“天”与“人”的统一性关系出发来发明彰显人存在的形上价值意义，由此实现了“天人合一”与“以人为本”的全面融合，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sup>①</sup>，其本意就是以“赞天地之化育”（不能逆天地之道而动）为人伦价值实现的基本路径，通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内圣外王”的艰苦自觉

---

<sup>①</sup>《中庸》。

修养来达到“与天地参”的终极性永恒至善境界。这一特点在《大学》这部伟大经典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部经典通篇只有 1546 字,可谓短小精悍,但其内涵博大精深,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发育万物,峻极于天”<sup>①</sup>,它洋溢着德化的积极进取精神,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文品质,在实践——精神地把握世界的伦理理性层面达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和令人景仰的道德境界,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与优势,又成为我们贡献给世界文明史的永恒奇葩。这部经典虽然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也有说是西汉初的),但它在人伦价值修养的目标、内涵、路径、品质等方面的精辟阐发,可谓历久而弥新,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这就是今天我们研读《大学》,依然充满亲切之感的原因所在。

研读《大学》,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一、读《大学》的正确态度

1. 以真诚之心读之。“诚心”是与“妄心”相对而言的。古人讲“心心相印”、“以心印心”,研读古人书籍一定要有诚恳的态度,不要没进入古人的世界,就虚妄地加以反对批判,这是唐突古人、数典忘祖。“五四”以来,国人对传统文化日益隔膜,时至今日,这种隔膜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误解、虚妄的轻视和片面的否定,事实上,这都是无知的表现。真所谓“无知者无畏”啊。我们要真正理解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传统,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做到“古为今用”,首先必须改变这种虚妄无知的态度,老老实实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小学生。古时候的人特别强调尊师重教,在进入学堂时先要拜孔子拜老师,当然“拜”只是形式,意在通过“拜”这个日常的基本礼仪,来激发学生虔心向学的赤诚之心。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

---

<sup>①</sup>《中庸》。

“诚”，“大哉一诚天下动”、“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sup>①</sup>只有诚心，才能发生心与心的交感。我们之所以能够拂去历史的尘埃，与古人直接对话，靠的就是一颗诚心。反之，若以虚妄之心对待传统文化，固无损于传统文化的伟大，但给那些“虚妄”的读者所带来的，将是更严重的无知和虚妄。殊不利于世道人心之淳化也！

2. 以恭敬之心读之。朱熹主张“居敬以穷理”，强调“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sup>②</sup>；反之，若“不知持守，身心散漫”，“放肆怠惰”，则“无缘见得义理分明”。<sup>③</sup>我们的文化先贤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使我中华民族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使得今天的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可资利用的丰厚文化资源。对前人创造出博大精深传统文化，我们理应抱持一种恭敬之心。具体就《大学》而言，这部两千多年前的古老经典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高度，委实令人赞叹，她藉由“三纲领八德目”所搭构的修身进德的文化殿宇，至今仍散发出温馨暖人的辉光。吾辈后生小子，在学习这部《经典》的同时，理应生稀有之心、生赞叹心，以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去瞻望圣人，细细揣摩文中的精义，学习古人在德性修养上达到的高度自觉性、恒心和毅力，继承并且弘扬古人的优秀传统。唯有先学习古人，才能超越古人。超越是在既有的文化传承基础上的。在这方面，任何“数典忘祖”式的唐突行为，均是自绝于文化的“野蛮”表现。

3. 以感激之心读之。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一代一代的古圣先贤前仆后继、共同努力、新火相传的结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滋润、教化了我们，所以我们对于先贤要有感激感念之情。作为一个大写的中国人，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诚如那首《我的中国心》所唱的：“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

①《孟子·离娄上》。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第211页。

③《答彭子寿》，《朱文公文集·别集三》。

中国印。”中国人，中国心，中国精神，在最深处就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代代相传。生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伟大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无疑是幸福的。今天，我们享受着中国文化这颗亘古长青的参天大树的庇荫，遥想当初种树人披荆斩棘的艰辛，护树人培植浇灌的劳苦，怎能不油然而生感激之情！？

4. 以弘发之心读之。任何一种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即开始了历史的流变历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永恒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内在地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对待历史文化，我们无疑要有发展的眼光。读古人古书，不是要回到过去，搞文化复古主义，而是要准确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摸清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以服务于现在，开辟出未来。因此，不能站在历史的门外，不能静态、抽象、片面地读，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而应该立足现实，把“返本”与“开新”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返本”是为了“开新”。我们廓清传统文化之庐山真面，把握其内在精髓，扬其精华，弃其糟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开新”必须“返本”。离开数千年来中国文化长期发展所累积起来的丰厚基地，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就建立不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根基。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事实上，这种结合点是客观存在的。其实践载体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理论结合点就在于传统文化在自觉、自强、自信的文化主体性上，在实现人生本质意义的价值意蕴上，在追寻“大同之世”的终极理想上，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近的文化品格。在这方面，一个相当成功的“结合”范例，就是毛泽东的文化理论。他关于文化重要性、文化领导权、文化人本性（服务人民）、思想改造和文化革新等方面的论述，与传统文化在精神趣旨上均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是奠立于民族文化根基上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讲文化

批判,讲辩证否定的“扬弃”,讲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这都是正确的、必须的,但是在批判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懂,要慎终追远,牢记先贤优良传统(千万不能向“文革”时红卫兵“扫四旧”那样搞文化破坏),然后立足现今,创新发展,争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更大光荣。

只有将上述四种态度统一起来,怀着虔诚之心、恭敬之心、感激感念之心和弘扬发展之心去认真学习,才能走进古圣先贤的世界,与古圣先贤“对话”,领悟其伟大智慧和崇高德性,以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也是今天我们研读《大学》和各类传统经典所应秉持的合理态度。

## 二、读《大学》的现代意义

1. 帮助我们找到生存的文化之根。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是肤色上、人种上和地域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一个中国人,应该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中华文化之根。叶匡政先生说得好:“只有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我们的记忆才能保持鲜活,我们在现实中才能感到光荣。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感。一个人不仅要有个人记忆,更要有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记忆,才能真实地把握自己行动的意义。”<sup>①</sup>中国历史上讲究“夷夏之防”,主张“以夏变夷”,反对“以夷变夏”,不是我们在人种上歧视外族,更不是要搞什么排外主义,而是视华夏文化为国脉,强调要守住中华礼乐文德政刑这个“立国之本”,以此来影响和带动所有民族共同进步,因此,所谓“夷夏之防”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大潮中,在此情势下,我们固然要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兼收并蓄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但前提是我们要珍视自己的伟大文化,严守中华文化根脉并发扬光大之,使之走向世界,造福人类。近代以来,西方优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坚船利炮征服了世

---

<sup>①</sup> 李璠等:《大学中庸高级读解》,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界,也把拜物主义和享乐主义腐朽价值观带向了全球,导致人类文化精神的严重沦丧。在中西文化关系上,我们也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泱泱中华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中华文化之“国本”几近动摇。所幸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国运。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①</sup>国家独立使得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大框架内,有效整合了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而传统文化也因吸取马克思主义的新鲜养分而可能走向复兴。期间虽也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动荡和浩劫,但传统文化的根脉仍不绝如缕,而且汲取传统精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较量中毫不逊色,从容自信。其间固然也曾有过对传统文化的严重破坏,但其文化建设之功亦大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步成绩巨大,举世瞩目,执政党对文化建设一直重视,但在具体实践中客观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文化建设在一些方面差强人意。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弱化,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市场经济所携的“拜物主义”大行其道,加上西方腐朽文化的颠覆性渗透,致使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泛滥成灾,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经受着持续的“沙漠风暴”的侵袭和蚕食。一个有着五千年惊艳世界之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时下竟出现了种种丧伦败德之不堪情形,怎不令人忧心如焚、扼腕叹息?!任何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自觉植根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充分理解、精心维护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继承和弘扬之,才能维护其民族独立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一个丧

---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失自己文化遗产的国家不可能长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丢失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单纯国籍意义上的国民，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中国人。时下国人中，不少可谓“穷则以利累形，富则以养伤身”，唯利是图而不及其余；知识阶层中不少人不仅在历史文化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而且存在严重的“文化洋奴主义”倾向，一切以帝国主义列强的是非为是非，视西方文化殖民主义霸权话语为“普世价值”而顶礼膜拜之。很多人种上的“华人”，对本民族文化一无所知，饱受西方文化荼毒而甘之如饴，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香蕉”（黄皮白心），这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叛。在“西强我弱”的大背景下，当前的中西文化复杂互动中，客观存在着“以夷变夏”的危险，为政者尤当警醒。从根本上说，丧失自己文化之根的人，如同漂泊流浪的文化孤儿和乞丐，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我们学习、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家园，寻到了自己的文化根脉。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一旦觅到中华文化内在的深层价值意蕴和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将会使我们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踏实。“中国人”的概念也会由苍白抽象变得丰富具体，并使得我们在各自的现实境遇中挺起脊梁，做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担当道义的大丈夫——一句话，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2. 是挽救世道人心的一剂良药。学习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建设性地作用于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乱象和中国社会的诸方面问题（如生态危机和人文精神失落等），我们确实应该摒弃喧嚣和浮躁，下一番“收拾身心”的功夫，以宁静澄明的心境去观照人生，寻觅人生的真价值、真意义、真境界，藉以安顿自己的灵魂，疗救癫狂的世道。在这方面，中华文化厚重的人文传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宝贵思想资源。今天，我们发掘传统文化的人文宝藏，对于医治种种“现代社会病”，可以起到“清热解毒、固本培元”的效果。

中华文化自破晓之日起，即体现了高度的人文精神自觉。《周易·系辞传》有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

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致思模式的，在天与人的统一性关系中探寻人生存的价值本位，并通过“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知性探索和“赞天地化育”的德性实践来实现生命意义的永恒和不朽。这就从发生学意义上规定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特质，并对其后的百家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即以挺立主体人格、提升道德境界、探寻人生真谛为宗旨，自始至终贯穿了生机勃勃的人文精神。它始终把人视为一个区别于禽兽的“类存在”，并努力发掘这种类存在的价值意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sup>①</sup>主张通过“仁”的扩充提升人性，通过诚意正心、切磋琢磨的修身之功来达致自我的“成人之境”，再通过己立立人、推己及人的心意感通实现人我的沟通，达到内外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的中庸境界。同时，它又具有强烈的人世倾向和现实情怀。它把身、家、国、天下贯通一体，强调通过修、齐、治、平的德化实践来实现自我，建构人伦，从而把“内圣”与“外王”、个人之“小我”与社会之“大我”有机统一起来，内涵了“民胞物与”的“天下”情怀，其最高价值理想是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sup>②</sup>

这种沛然洋溢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于儒家经典的字里行间，而且贯穿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程，并在人的“类”本质和“类”价值的实现上，开辟了“进德修身”之人文路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义利之辨”上。传统儒学肯定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sup>③</sup>的基本事实，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有恒产而有恒心”<sup>④</sup>、“仁政必自经界始”<sup>⑤</sup>。但为政者谋利，绝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荒淫享乐，而应该以百姓

---

①《礼记·冠义》。

②参见《礼记·礼运》。

③《礼记·礼运》。

④《孟子·梁惠王上》。

⑤《孟子·滕文公上》。

之利为利，发政施仁、制民之产、敬德保民（反之则为“率兽食人”的虐政）。但物质财富只是人的生存手段，而非终极价值，若一味放纵欲望，耽于求利，则会“放于利而行，多怨”<sup>①</sup>。故而当以义统利，行利之宜，在制民之产、庶民富民的基础上，施以礼乐文德政刑的教化之功，实现“天下归仁”、“沛然与天地同流”的治化佳境。从根本上说，儒学对“事功”问题的认识和定位是清醒而深刻的，事功乃人生之所必须，没有事功就活不下去；事功又绝非一切，只具手段意义而终非究竟；要实现人生的恒久价值，则必须诉诸“路漫漫兮修亦远”的修养实践，这就是《大学》强调“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精义所在。这一清醒认定使得中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未曾因耽于事功、沉沦物欲而迷失文化方向。其中内涵的“以财发身，以身合道”的基本理路，可谓存神过化、光照千秋，其对今日中国与世界的时代意义尤显焉。

自工业革命迄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使科技理性得以彰明，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力极大进步，物质财富极大丰盈，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关系异化和人文精神失落，造成了种种“现代社会病”。笔者时常感慨于如下的历史事实：在生产落后、物质财富贫乏、生活水平与今天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古社会，人类反而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成果，并从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高度，彰显了人存在的崇高价值意义。如雅斯贝尔斯就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里，中国、印度、古希腊、以色列等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构成人类至今仍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基础。<sup>②</sup> 时至今日，人类好不容易走出了以往的物质贫乏时代，获得

---

① 《论语·里仁》。

② 参见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了发达的生产力和丰裕的物质财富，却又不幸深陷“类本质”异化的泥潭，沦为热带丛林中弱肉强食的“经济动物”。这难道是人性的天然缺陷？是人类必然性的悲惨宿命？其实不然。导致物质丰裕而精神沦丧、科技进步而人文缺失之怪现状的祸首，就是那个不是人的——资本的主义！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已经书写并证明了其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历史性功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藉以呼唤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魔术，却是资本的物役性“魔咒”。在社会化大生产+资本私有制+雇佣劳动+市场经济的特定生产方式下，资本操控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必然服从于资本家榨取利润的目标。雇佣劳动的剥削手段是非人化的，为物不为人的生产目的是非人化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也必然是非人化的。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必然不断推进科技进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不断扩大的财富成果却被资本家独享，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同时，受贪得无厌的欲望驱动的、贪得无厌的扩大再生产必需有日益庞大的资源、能源消耗，这必然导致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受贪欲驱动的、贪婪的扩大再生产必须找到相应的市场，为此，就必须不择手段扩大消费，无限制地扩张和压榨每个人的消费潜能。这样，在资本指挥棒的操控下，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是必然的了。在这里，每个人都成为实现利润的工具，都成为消费的机器，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全部服从于资本的利润逻辑，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及其各个方面，都处于日趋严重的异化和对立状态。这就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已经使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空前严重，“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凸然摆在人类面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千万不要妄想资本主义有什么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天人和谐的神奇“法术”。若不从根本上改变

目前人类这种倒行逆施的罪恶生存方式,等待我们的将是灭亡。二是人与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普遍的剥削、压迫、奴役,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和对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要通过市场交换价值来实现,每个人都成为利己主义经济动物,视弱肉强食为天然法则,不是你剥削奴役别人,就是别人剥削奴役你,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状态成为社会常态,商品金钱拜物教成为唯一的宗教,纵情享乐、声色犬马成了生活的主要意义和目标。资本主义诚然是罪恶的主义!把人变成动物的主义!灭绝人性的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受市场经济物化大潮的胁裹,整个社会“物役化”程度正在加深。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弱化、外国资本的盘剥和控制、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教育文化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共同发酵,我国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过程中的较多突出问题。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西方的各种“现代社会病”(既有外部传染,也有内部自生),在诸如环境危机、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精神空虚、价值观人生观扭曲、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等具体“病症”上,我们可谓“病得不轻”。当此之际,我们抖落一身的尘埃,回到书房,重温先贤的经典,追寻祖先光辉的智慧和美德,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维稳促和之方,祈可有所补益云。

3. 是建构当代中国大学之道的重要资源。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承担着社会教化的重要功能。大学该教什么书?育什么人?怎么教?怎么育?其中大有讲究。《大学》这本经,主要念的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时候大(tài)学的办学宗旨就是这三句话,青年人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也在这三句话(“三纲”统摄了“八目”)。这三句话非常强调道德修养,基本理念是“内圣外王”,着眼于启发青年学生的文化和道德自觉,激发同学们的良知、责任感和担当大任的使命感。这里面绝口不提什么升官发

财,不提什么教育产业化,没有什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色彩,反倒充满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体能动精神。从理论上说,此种办学宗旨和教育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那么此种办学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自先秦迄于清末,我国社会的阶层分类历来有士农工商的“四民”之说。其中的“士”,主要指知识分子,他们构成所谓“精英阶层”,既是社会精神文化的直接生产者、整理加工者和传播者,又是各级官僚的后备军。这些士人们都是经过各级官学和私学培育出来的,他们修习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等各种学问,主要学习《诗》、《书》、《礼》、《易》、《春秋》(所谓“五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其中的《礼》,原只有《仪礼》17篇,到战国时又有了以政治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周礼》(原名《周官》),到西汉末,戴德传《大戴礼记》85篇,其侄戴圣加以删辑,成46篇《小戴礼记》,后经郑玄增补3篇并作注,使得49篇《小戴礼记》得以广泛流传。时至南宋,朱熹取《小戴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作为士人读书的最重要教材,其地位甚至在“五经”之上。

《大学》为战国时曾子及其门人后学“祖述弘发前圣”所著,其影响极其广泛深远。自两汉以来,高等官学和私学均以此为办学主旨,而初等学校的办学精神实亦由之统摄。二千多年来,一代代的读书人浸淫于“大学之道”,进而把它的影响施及官府和民间,对传统国人的心理——精神各层面起到了“基本建设”作用,也构成中华文化的一重基本的原生态底色。就其影响的广泛性而言,它在整个社会确立了修身明德、内圣外王的核心价值观,且贯穿了二千多年各个阶段的历史发展,对促进思想统一和社会“大一统”,维护稳定秩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均可谓“居功至伟”(今天我们搞文化建设,往往浮光掠影,不易落到实处,所为何因?当深思之,并有所学习借鉴)。具体就受“大学之道”教育出来的知识群体来说,其中固不乏汲汲于功名富贵、“终日从事者,虽圣贤之书,而

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于圣贤背而驰者矣”<sup>①</sup>的沽名钓誉之徒，甚至“言行相违”、“口谈道德”、“心有高官”、“行若狗彘”<sup>②</sup>的伪君子，但这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并不构成知识阶层的主流。“大学之道”培育的更多的是教化传道、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sup>③</sup>正是这些志士仁人，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最强健、最精华的部分，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士人中薪火相传，既表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态度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又表现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情怀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视死如归精神，它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也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历尽磨难而不衰的奥秘所在。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始于1898年创设的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却留下了国立北京大学这一仅存的硕果。学校创办之初旧气息很重，基本替代科举而为干禄捷径。到民国五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对北大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使之呈现出完全崭新的气息，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翘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体现的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办学理念，在当时确实起了“开时代风气”的作用。在北大的影响和带动下，民国前后，全国各地先后创办的各所大学也多奉之为圭臬，这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繁荣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若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则似乎仍有不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价值主旨是什么？要实现并服务于什么目标？不甚了了。当时，中国已经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自由主义虽有功于学术，但并未体现时代主题，也不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在中华

①《陆九渊集》卷二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第276页。

② 参见李贽《焚书》。

③《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民族内忧外患、生死存亡之际，近代大学在体现民主科学精神的同时，更应突出强调反帝爱国，围绕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富强的大目标来确立新时期的大学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 20 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大学精神，在价值理性自觉上尚有所不逮。这也是它相比于传统“大学之道”而有所差距的地方。

梅贻琦先生 1931 年底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强调大学不仅要有大楼等硬件设施，更应该有优秀的教师教育学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诚然如此。但大学光有“大楼”、“大师”就够了吗？还远远不够啊。我认为在“大楼”、“大师”之外，还要再加上两项：“有大生之谓也”，“有大道之谓也”。“有大生之谓也”，就是要培养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材，而且越多越好。这是办大学的出发点与目的。我们讲教育要“以人为本”，很重要的就是以学生为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我们老师教书，不只是为了混饭吃，目的在于育人，在于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大生”，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如果我们把大学比作“人才工厂”，那么这座工厂正因为产出一批批“大生”而显出了它的价值。如湖南第一师范培养了毛泽东，天津南开学校培养了周恩来，这两个伟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国运；培养伟人的这两所学校，也因此而载入史册。所以说，大学在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同时，也造就了它们自身的辉煌。“有大道之谓也”，就是大学要有自己的“道”——大学精神。这个“大学之道”，可以说是大学的灵魂，它从根本上体现了一所大学的人文品格。好的大学在这个“格”上，都是比较高的。如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易经》上那两句名言的浓缩本，既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清华奋斗历程的精神写照。如南京大学的校训是“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很好体现了这所百年名校的深厚文化积淀和人文品格。反之，一所大学若没有真正的“大学之道”，那就是没有灵魂。那么它即使大楼再多、再高，也难出什么“大师”，更不用说德才学识均属上乘的“大生”了。